

中国青年政治支持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治观念、媒介使用、社会资本与代际差异

■ 虞 鑫 王金鹏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随着媒介化政治的普遍性显现,媒介或媒体愈发成为政治支持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之一。为探究影响青年政治支持的媒介化因素及其机制,本文采用配额分层抽样调查与逐步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媒介使用、政治观念和社会资本三类变量对于青年政治支持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结果表明,对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而言,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有着显著的相关性;政治观念既直接影响着青年的政治支持,又在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的影响机制中发挥调节效应;社会主义倾向能够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媒介化手段正向促进政治支持,自由主义倾向则更多地直接降低其政治支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不同代际之间的相关情况也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年轻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易受西方媒体影响而降低,上一代青年则易受主流媒体、商业媒体的影响;保守主义倾向对上一代青年政治支持的正向影响要比对年轻一代青年的影响更大;而社会资本转化为政治支持的机制类型也从纽带式资本主导转向了桥梁式资本主导。因此,要全面加强数字时代党的青年工作。

【关键词】媒介使用 政治支持 政治观念 社会资本 代际差异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2.01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其中,要深刻认识到“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当前党和国家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随着国际秩序与权力结构不断变化,“东升西降”已然成为国内学者的普遍观点,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对于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干预和舆论斗争。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在民众层面探究政治支持的来源、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作为最早见于西方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研究的学术概念,政治支持最早由美国政治

收稿日期:2023-01-26

作者简介:虞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新闻理论、政治传播;
王金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政治传播。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坚守新闻真实性的路径、机制与方法研究”(课题编号:21CXW001)、清华大学“清新计算传播学与智能媒体实验室研究支持计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学家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提出,可以进一步分为普遍支持(diffuse support)和特定支持(specific support)^[1]。前者指向公民对于国家现行政治体制的一般性支持态度,亦即对政制合法性的支持,而后者是出于公民对特定政策和政府绩效的利益性支持^[2]。尽管在伊斯顿的理论建构中,信任(trust)被归为基于感情倾向的普遍支持,即是否相信政府是保护公民利益的,属于政治支持下的子概念之一,但是随着政治心理学研究趋于实证化,政治信任被归入特定的政治支持范畴,以区别于对政体及其原则的支持^[3]，“信任”逐渐等同于态度性的支持,二者之间也基本可以通用^[4]。然而,当研究者们将政治信任运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研究时,却面临着理论与方法论的挑战,多数既有研究基于实证经验的理论化层面,因而缺乏对于政体和社会的基础性价值层次的深入,而是直接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范式的政治文化理论框架^[5]。受此启发,本研究选用政治支持作为关注的核心概念,并主要探讨普遍的政治支持。在政治语境下,这既呼应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基础转型^[6],又与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息息相关^[7]。

然而,尽管较多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民众的政治支持水平较高^[8],但这一指标在近年来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9],政治支持处在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

其一是国际传播格局呈现西方中心主义和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媒介化政治背景下,媒体愈发成为民众获取政治信息、表达政治意见乃至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然而媒介本身带来的舆论偏倚^[10]、行业集中造成的商业垄断^[11],以及政府日趋显著的行政公关化^[12],无不在广泛的媒介使用与良好的民主政治之间形成一道道沟壑。在更为宏观的国际层面上,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社交媒体,媒体本身已然深刻地嵌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中,西方跨国传媒集团无不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舆论先行者,为他国公民的政治支持带来潜在的不确定性,由此引发围绕各国政治制度建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等的种种纷争。因此,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当下,有必要结合媒介化政治这一新的语境,对公众的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开展系统性的实证研究。

其二是多元社会思潮导致政治观念和价值取向多样化。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个体的自我叙事与理性考量成为社会运作的多元逻辑之一。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以来建立起的革命叙事也与西方现代化叙事产生碰撞,体现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中国与世界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矛盾建构上。在这一媒介与政治的互构过程中,政治观念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长期来看,在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之中,媒介作为中介的“象征性现实”,影响着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13];而短期来看,政治观念又影响着人们的新闻媒介偏好^[14],人们往往选择与自己观点相一致的内容信息^[15],在算法时代则表现为主动或被动地构筑起信息茧房^[16]。既有研究表明,价值观的不同倾向能显著影响中国公众的政治支持,且传统的权威价值观与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效应截然相反^[17]。因此,探究不同政治观念取向与政治支持的关联,并就政治观念在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同样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其三是网络数字社会带来互联网生存图景和青年代际差异。对于现今的年轻一代青年而言,他们既是数字化生存的一代,是互联网原住民,又难免受到互联网中相随而至的多种社会思潮影响。这也就造成,一方面,青年群体成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主力军^[18],甚至产生“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的粉丝民族主义现象^[19];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网络泛娱乐化等趋势,无不削弱着主流政治观念话语在青年中的影响力,为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带来诸多困境^[20-21]。那么,作为数字时代原住民的青年是否在媒介使用、政治观念与政治支持的关联中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也将是本文所关切的问题之一。

总的来说,本文将立足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结合媒介化政治的社会语境,从实证层面探究公众的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的作用影响,以及政治观念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并分析青年在这一机制中表现出的新特征,为数字时代的青年研究与国家治理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媒介与政治支持的形成机制

在伊斯顿政治支持理论的基础上,后续研究者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政治支持的客体上,而非普遍支持与特定支持的概念区分,因为对于政治系统的态度“通常包括情感和评价两个维度”^[22],从经验上讲,很难将其应用于普遍或特定的二分法。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和罗素·道尔顿(Russell Dalton)等学者将政治支持的客体按其抽象程度分为了五个层次,在各个层次当中,政治支持被划分为两种态度取向,分别是感情倾向(affective orientation)和工具评价(instrumental evaluation)^[23]。在这一划分中,普遍或特定的两类政治支持只有相对的倾向而不具备绝对的界限。这也为探讨政治支持的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点。在政治态度研究中,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构成了两条主要的分析路径^[24]。制度主义路径从理性选择的视角出发,强调政治绩效及其制度特性对于公众政治支持的内生性效应^[25],这也得到了来自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等的多项实证研究支持^[26-27]。相较之下,文化主义路径则重视个人经历、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资本等因素对于公众政治支持的外生性效应^[28]。部分研究试图超越这两条传统的解释路径,包括但不限于将一般信任作为两条路径间的相互作用变量^[29],或是将中国的社会结构补充性地纳入公众政治支持的来源^[30],等等。

随着媒介化政治的普遍性显现,媒介或媒体愈发成为政治支持研究中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之一。早期的媒介与政治支持相关研究聚焦于报纸、电视等具体的媒介形态对于政治信任、政治认同和支持等态度的积极或消极影响^[31-32]。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较多研究表明,互联网为中国民众拓宽了政治信息渠道^[33],呈现出多元的解释观点^[34],从经济绩效与文化价值观两方面降低了国内民众的政治信任^[35-36],并带来更低的政治支持水平^[37-38]。然而,随着互联网日益复杂的舆论生态环境的发展,中国主流媒体积极地寻求着在互联网转型过程中实现媒介深度融合^[39],或许应当采用一种更为细致的分类法。一般认为,对主流媒体的接触和使用往往带来更正面的政治态度,而市场化媒体和海外媒体则倾向于降低民众的政治支持^[40]。然而,也有部分实证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认为主流媒体的使用并不会对政治态度带来显著影响^[41],非官方媒介的使用也不见得会降低民众的政治支持^[42],而是呈现出“U”型变化,即非官方媒介接触达到一定峰值后政治支持不降反升^[43],抑或是对民众的普遍政治支持带来一定的正向作用^[44]。还有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在选择性接触相对正面的外国媒体报道后,反而会纠正他们固有的西方美化形象,从而提高对国内的政治评价^[45]。

整体而言,尽管前述文献将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的关联性做了相当丰富的实证研究,但对于二者关联的稳健性缺乏基于中间变量的考察,以至于其间结论的矛盾之处未能得到好的解答。本文将通过引入政治观念这一解释变量,尝试对既有结论作出检验。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将中国民众的媒介使用划分为主流媒体、商业媒体和西方媒体,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1:中国青年民众的主流媒体使用与其政治支持呈正相关性。

假设1.2:中国青年民众的商业媒体使用与其政治支持呈正相关性。

假设1.3:中国青年民众的西方媒体使用与其政治支持呈负相关性。

(二)政治观念的两种影响路径

在经历数百年的理论发展之后,政治观念或意识形态成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学者对它的定义和阐释也十分多元^[46]。站在现实的角度上,或许既可以将其理解为代表特定社会集团的一整套思想信仰或信念体系,也可以视作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阐释和规范性观念,抑或是一类使自身合法化的政治手段^[47]。天然地,政治观念立场就与政治行为紧密联系,诸如保守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影响着个体对于特定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因而在政治行为上倾向于选择与自身相符的社会政策,并支持特定的政制或政体。回顾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构成了深刻影响中国的三种价值取向^[48],其中,保守主义是指文化保守主义,强调尊重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有别于现代政党政治里的概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49]。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1:中国青年民众的社会主义倾向与其政治支持呈正相关性。

假设2.2:中国青年民众的自由主义倾向与其政治支持呈负相关性。

假设2.3:中国青年民众的保守主义倾向与其政治支持呈正相关性。

如前所述,政治观念与媒介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在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过程中,媒介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拟态环境”或“象征性现实”,形塑着人们的政治认知与政治观念^[50]。另一方面,在对新闻媒介的选择性偏好中,意识形态又发挥着先验而潜在的作用^[51]。针对中国网民的一项调查(N=1200)显示,较为亲近西方的中国公民更倾向于阅读有关外国的正面内容或有关中国的负面内容^[52]。与此同时,日趋复杂多元的媒介环境降低了用户的媒介使用与个人偏好之间的关联性^[53],使得人们不论其偏好如何,都能够接触到更为多样化的观点与内容^[54]。那么,作为个体属性的政治观念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的影响机制,这是以往研究中未能解答的疑问。因此,本文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3:中国青年民众的政治观念倾向在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

(三)社会资本与代际差异

从文化主义的视野出发,社会资本无疑是公众个体政治支持的来源之一^[55]。从定义上看,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56]。这一假定认为,个人的生活状况和经历,特别是人们在社会网络中的嵌入和参与,在人与人之间创造了普遍信任和互惠,进而溢出到政治支持。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分为“桥梁式资本”和“纽带式资本”,分别对应于弱关系和强关系,前者互动频率低但有利于联合异质性的外部资源并且传递信息,后者互动频率高且能提供重要的社会和心理支持,但容易使自身变得狭隘^[57]。互联网时代,民众可以通过微博、知乎、豆瓣等社交平台参与社群讨论、获取政治信息、发表公共意见、消费和生产政治知识等,这为公众将线上团体内部的信任机制转化为对整个政制的普遍政治支持提供了较好的前提条件。然而,既有研究未就社会资本的两种形式与政治支持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对于桥梁式资本和纽带式资本在影响公众政治支持上的关联和区别仍有待考察。有研究表明,线上桥梁式资本往往与多样化的内容寻求相关联^[58],而纽带式资本则侧重于提供重要的社会支持。基于桥梁式资本的信息传递作用与纽带式资本的社会支持作用,本文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4.1:中国青年民众的线上桥梁式社会资本越高,其政治支持越高。

假设4.2:中国青年民众的线上纽带式社会资本越高,其政治支持越高。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 Inglehart)等学者的后物质主义强调经济社会现代化带来了价

价值观代际转型^[59],从而影响公民的政治支持态度^[60]。中国于1994年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此后互联网不断深刻地变革着整个社会的媒介环境,这一过程恰与年轻一代青年的社会化过程相重叠。由此,本文依据青年群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媒介环境以及调查执行时间对应的年龄,将青年群体划分为上一代青年(1976-1989年出生)和年轻一代青年(1990-2002年出生)。与上一代青年群体相比,年轻一代青年伴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而成长,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形影不离,也难免受互联网中相随而至的多元政治观念影响。据此,本文认为年轻一代青年群体的政治支持受到媒介使用和政治观念的影响更大,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5.1:媒介使用对于中国年轻一代青年政治支持的影响比上一代青年要更显著。

假设5.2:政治观念对于中国年轻一代青年政治支持的影响比上一代青年要更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抽样

本文选取中国1976年至2002年出生的青年作为研究对象,数据委托凯度调查公司(Kantar Profile)依据性别、年龄、家庭所在地等配额在凯度线上样本库进行分层并划定抽样比例,随后从每层中抽取独立随机样本填写线上调查问卷,覆盖了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调查实施时间为2020年12月4日至2021年1月7日,经过问卷筛选及数据清洗,共回收有效样本901份。

本研究经由配额控制了一系列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龄(出生年份)、性别(1=女性,0=男性, M=0.50)、家庭所在地(1=地级市及以上,0=县级及以下, M=0.74)、职业类型、家庭年收入以及教育水平,如表1所示。其中,职业类型为“无业”的样本变量赋值为1,并将后续分组依次编码成为取值范围为1-3的定序变量;家庭年收入为“3万元以下”的样本变量赋值为1,并将后续分组依次编码成为取值范围为1-7的定序变量;由于样本中不存在教育水平为小学毕业及以下的案例,故将教育水平为“初中毕业”的样本变量赋值为1,后续分组则依次编码成为取值范围为1-5的定序变量。

表1 样本的基本情况表(n=901)

变量	类型划分	人数	有效百分比(%)
年龄	1990-2002年出生	493	54.72
	1976-1989年出生	408	45.28
家庭所在地	地级市及以上	665	73.81
	县级及以下	236	26.19
职业类型	无业	91	10.10
	普通类职业	475	52.72
	管理类职业	335	37.18
家庭年收入	3万元以下	36	4.00
	3万元≤家庭年收入<8万元	67	7.44
	8万元≤家庭年收入<12万元	146	16.20
	12万元≤家庭年收入<20万元	323	35.85
	20万元≤家庭年收入<40万元	227	25.19

(续表)

变量	类型划分	人数	有效百分比(%)
家庭年收入	40万元≤家庭年收入<60万元	63	6.99
	60万元及以上	39	4.33
教育水平	初中毕业	5	0.55
	高中毕业(中专、技校)	43	4.77
	大专毕业	124	13.76
	本科毕业	643	71.37
	研究生及以上毕业	86	9.54

(二)变量测量

政治支持(political support, 被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参考了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开展的“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SGS2015)问卷以及郑振清等^[61]关于政治支持的研究, 结合新冠疫情背景作出适当改动, 共设计了6个题项以测量公众的普遍政治支持水平($M=4.22$, $SD=0.61$, $Cronbach's \alpha=0.844$)。该问题的题干为“2020年以来,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 各国政府均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予以应对。关于以下叙述, 你的看法如何”, 具体答案参照五点李克特量表进行设计, 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排列。6个题项包括“此次抗击新冠疫情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相比于其他国家抗击疫情的表现, 我对中国的表现感到自豪”“相比于其他国家, 我更倾向于在中国的制度下生活”“中国为国际抗疫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即使存在疫情影响, 中国也能在今年实现经济正增长”和“我愿意为疫情防控牺牲个人的部分自由和隐私”。

媒介使用(media use, 解释变量): 借鉴“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问卷以及王菁^[62]关于媒介使用的测量方式并加以修改, 本文将该问题表述为“当查找关于时政新闻、时政事件等信息时, 你访问这些媒体的频率是”, 答案按照“1=几乎没有, 2=较少, 3=偶尔, 4=经常, 5=非常频繁”进行分类。在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形成了三类媒介使用变量: (1) 主流媒体($M=3.60$, $SD=0.82$), 单一题项为“《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主流媒体”; (2) 商业媒体($M=3.41$, $SD=0.72$, $Cronbach's \alpha=0.739$), 包括“《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地方媒体”“《人物》、财新等商业媒体”“新浪网、搜狐网等门户网站”和“今日头条、网易新闻等新闻类APP”4个题项; (3) 西方媒体($M=2.73$, $SD=1.03$, $Cronbach's \alpha=0.886$), 包括“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卫报》、BBC等的政治新闻”“西方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等”和“西方网络媒体如Politico、Breitbart等”3个题项。

政治观念(political idea, 解释变量): 关于政治观念的测量目前已发展出许多量表, 主要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通过个人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展开评估, 进而确定其在政治观念谱系中所处地位^[63]。本文综合参考了“中国政治坐标系”问卷、“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问卷和吴^[64]关于中国网民信念体系的研究, 经过因子分析, 区分出社会主义($M=3.91$, $SD=0.52$, $Cronbach's \alpha=0.638$)、自由主义($M=2.93$, $SD=0.79$, $Cronbach's \alpha=0.682$)和保守主义($M=3.87$, $SD=0.56$, $Cronbach's \alpha=0.635$)三种政治观念倾向, 分别由4-5个题项组成。需要指出的是, 既有量表多采用“同意”或“反对”的选项促使受访者在其中做出选择, 从而判定其政治观念立场, 但本文的测量意不在此, 而是希望以此代表其个人的政治观念倾向, 并未将其中维度作为相互对立的而理解, 故本文采用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的回答设计。具体题项如下页表2所示。

表2 三种政治观念倾向的测量题项

政治观念倾向	量表题项
社会主义 (Cronbach's $\alpha=0.638$)	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其他重要国计民生的领域,必须由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 中央政府应当在财政领域享有充分的分配权力,这样可以帮助落后地区发展。 政府应当尽可能地提高最低收入,提供低价医疗和教育。 国家应当采取措施培养和支持体育健儿在各种国际比赛中为国争光。 如果猪肉价格过高,政府应当干预。
自由主义 (Cronbach's $\alpha=0.682$)	土地产权应该归个人所有,而不是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该越少越好。 浪费粮食是个人的自由。 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垄断地位是无害的。
保守主义 (Cronbach's $\alpha=0.635$)	尊崇我们的儒家传统文化和习俗很重要。 生活中并非只有“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与人为善”这样的道德原则才应该是我们的生活准则。 中国历史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其价值所在,即使不符合西方政治学理论。 应当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作为儿童基础教育读物。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解释变量):对于线上社会资本,本文设计了具体的社会场景以便于被访者予以评估,参考借鉴了威廉斯(Williams)^[65]和埃利森(Ellison)等^[66]关于桥梁式社会资本和纽带式社会资本的量表,经过因子分析形成:(1)线上桥梁式社会资本(M=3.99,SD=0.55,Cronbach's $\alpha=0.861$),包括“与人交往令我对周身以外的事情产生了兴趣”等8个题项;(2)线上纽带式社会资本(M=3.76,SD=0.67,Cronbach's $\alpha=0.692$),包括“一些朋友能为我带来求职的资源”等3个题项。答案选项按照“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进行排列。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901)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题项数	Cronbach's α
被解释变量	政治支持	4.22	0.61	1	5	6	0.844
解释变量 (媒介使用)	主流媒体	3.60	0.82	1	5	1	/
	商业媒体	3.41	0.72	1	5	4	0.739
	西方媒体	2.73	1.03	1	5	3	0.886
解释变量 (政治观念)	社会主义	3.91	0.52	1.6	5	5	0.638
	自由主义	2.93	0.79	1	4.75	4	0.682
	保守主义	3.87	0.56	1.25	5	4	0.635
解释变量 (社会资本)	桥梁型资本	3.99	0.55	1	5	8	0.861
	纽带型资本	3.76	0.67	1	5	3	0.692
控制变量	年龄	30.30	6.92	18	44	1	/
	性别	0.50	0.50	0	1	1	/
	家庭所在地	0.74	0.44	0	1	1	/
	职业类型	2.27	0.63	1	3	1	/
	家庭年收入	4.09	1.32	1	7	1	/
	教育水平	3.85	0.67	1	5	1	/

三、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代入媒介使用、政治观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的变量以检验前述假设。为了避免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方差膨胀系数(VIF)的方式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3,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状况。政治支持的逐步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1仅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模型2到模型4则依次增加了媒介使用变量、政治观念变量和社会资本变量。

表4 政治支持的逐步多元线性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因变量:政治支持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控制变量				
性别	0.114***	0.067*	0.022	-0.001
年龄	0.052	-0.026	-0.028	-0.029
家庭所在地	-0.037	-0.032	-0.017	-0.012
职业类型	0.003	-0.001	-0.001	-0.002
家庭年收入	-0.015	-0.005	-0.050	-0.065*
教育水平	0.066 [△]	0.020	0.012	0.007
媒介使用				
主流媒体		0.316***	0.130***	0.120**
商业媒体		0.091*	-0.007	-0.056
西方媒体		-0.245***	-0.066*	-0.060 [△]
政治观念				
社会主义			0.306***	0.250***
自由主义			-0.195***	-0.210***
保守主义			0.294***	0.252***
社会资本				
桥梁型资本				0.134**
纽带型资本				0.082*
N	901	901	901	901
R-squared	0.021	0.154	0.431	0.453

注: [△]p<0.10, *p<0.05, **p<0.01, ***p<0.001; 上述回归模型均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表中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模型2加入了媒介使用的三个子变量后,性别和教育水平对政治支持的影响显著性明显降低。回归结果显示,主流媒体、商业媒体的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而西方媒体的媒介使用则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但从标准化系数上看,主流媒体对政治支持的正向效应($\beta = 0.316$)要大于西方媒体的负向效应($\beta = -0.245$),二者均远高于商业媒体带来的正向效应($\beta = 0.091$)。结合模型3、4的结果发现,商业媒体的正向效应在后续模型中消失,甚至呈负相关性(但统计不显著)。因此,假设1.1、1.3得到了较好的检验,假设1.2不成立,即主流媒体的使用对于青年民众政治支持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而西方媒体的使用则倾向于降低青年民

众的政治支持,商业媒体的使用对政治支持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3检验了政治观念变量对于青年民众政治支持的影响。在加入政治观念变量后,媒介使用中的商业媒体、西方媒体变量均出现了显著性上的降低,这表明,政治观念取代了部分的媒介使用因素,成为影响政治支持的主要来源。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主义倾向、保守主义倾向与政治支持呈显著正相关,而自由主义倾向则与政治支持呈显著负相关。比较三者间的标准化系数,自由主义倾向对政治支持的负向效应($\beta = -0.195$)要明显低于社会主义倾向($\beta = 0.306$)和保守主义倾向($\beta = 0.294$)。因此,假设2.1、2.2和2.3均得到了支持,即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更容易激发中国青年民众的政治支持,而自由主义更可能抑制政治支持。

模型4考察了两种线上社会资本对于政治支持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桥梁式社会资本和纽带式社会资本均与政治支持呈显著的正相关性,从而支持了假设4.1和4.2。从标准化系数来看,桥梁式资本的正向作用($\beta = 0.134$)要高于纽带式资本($\beta = 0.082$),表明弱关系带来的知识扩散更有可能提高青年民众的政治支持水平。此外,加入社会资本变量后,作为控制变量的家庭年收入在模型中变得显著了: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受访者,其在政治支持上却表现出越低的水平。

从总体上看,从模型1至模型4,R方系数从0.021提升至0.453,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在各项逐步回归中,R方变化量的F检验结果均为显著,表明新加入的解释变量对于政治支持这一被解释变量有着足够强的边际效应,是应该被纳入模型考量之中的。这也表明,本文采用媒介使用、政治观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作为政治支持的自变量是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至此,假设1、假设2和假设4均已得到基本验证,但假设3和假设5的检验仍然需要进一步考察政治观念与媒介使用之间的交互效应,并依据不同年龄段对现有青年样本进行区分,从而完成异质性分析。

(二)政治观念的调节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在前文基准回归分析得到模型M1的基础上,本文继续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类政治观念与媒介使用的交互项纳入考量,得到模型M2,以检验政治观念对媒介使用和政治支持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综合考虑样本数量的代表性及其年龄层次后,本文将样本划分为1990-2002年出生的年轻一代青年($n=493$)和1976-1989年出生的上一代青年($n=408$),分别对应模型Y1与模型Y2。正如文献综述部分所述,尽管政治观念与媒介使用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但就短期的截面数据而言,媒介的涵化作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本文将政治观念作为既定属性,进而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代表着政治观念发挥的调节作用,而非媒介使用。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将媒介使用与政治观念两个维度的变量中心化后,再行构建交互项并加入模型,最终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政治支持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不含交互项	含交互项	1990-2002年出生	1976-1989年出生
	模型M1	模型M2	模型Y1	模型Y2
控制变量				
性别	-0.001	-0.005	0.004	-0.020
年龄	-0.029	-0.023	-0.029	0.012
家庭所在地	-0.012	-0.011	-0.048	0.075 [△]
职业类型	-0.002	-0.004	0.032	-0.075 [△]
家庭年收入	-0.065*	-0.057 [△]	-0.083*	0.006
教育水平	0.007	0.006	-0.001	0.019

(续表)

变量	不含交互项	含交互项	1990-2002年出生	1976-1989年出生
	模型M1	模型M2	模型Y1	模型Y2
媒介使用				
主流媒体	0.120**	0.114**	0.028	0.205***
商业媒体	-0.056	-0.040	0.028	-0.114*
西方媒体	-0.060 [△]	-0.083*	-0.095*	-0.064
政治观念				
社会主义	0.250***	0.237***	0.261***	0.236***
自由主义	-0.210***	-0.219***	-0.222***	-0.206***
保守主义	0.252***	0.249***	0.171***	0.320***
社会资本				
桥梁型资本	0.134**	0.118*	0.211***	-0.026
纽带型资本	0.082*	0.095**	0.044	0.196***
交互效应				
社会主义*主流媒体		-0.059	-0.079	-0.098
社会主义*商业媒体		-0.090*	-0.124*	-0.052
社会主义*西方媒体		0.079*	0.143*	0.014
自由主义*主流媒体		-0.014	-0.000	-0.017
自由主义*商业媒体		0.041	0.070	-0.026
自由主义*西方媒体		-0.025	-0.015	-0.025
保守主义*主流媒体		-0.026	-0.068	0.028
保守主义*商业媒体		0.069	0.138 [△]	0.018
保守主义*西方媒体		0.024	-0.075	0.113*
N	901	901	493	408
R-squared	0.453	0.473	0.501	0.488

注：[△]p<0.10, *p<0.05, **p<0.01, ***p<0.001;上述回归模型均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表中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比较模型M1与模型M2,在加入政治观念与媒介使用的交互项后,模型的R方由0.453提升至0.473,表明模型整体解释力有所提高。在将样本区分为两个年龄段后,模型Y1和模型Y2的R方均维持在0.48-0.51之间的较高水平,表明分段后的两个模型仍具备较好的现实解释力。通过比较回归结果,得到如下发现。

1. 媒介使用方面。模型M2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政治观念的调节效应后,主流媒体、西方媒体使用仍然与政治支持保持了显著的直接效应($\beta_1=0.114$, $\beta_2=-0.083$),这再次验证了前述结论的稳健性,即主流媒体使用有利于提升民众政治支持,西方媒体反之。商业媒体使用与政治支持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Y1与Y2在媒介使用变量上的数据结果表明,西方媒体使用与年轻一代青年群体的政治支持呈显著的负相关性($\beta=-0.095$),而主流媒体、商业媒体使用则与上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分别呈显著的正相关、负相关($\beta_1=0.205$, $\beta_2=-0.114$)。因此,假设5.1得到了部分证实与证伪:对于年轻一代青年而言,西方媒体使用对于政治支持的负向影响要比上一代青年更为显著,而主流媒体、商业媒体的影响则更不显著。

2. 政治观念方面。模型M2表明,社会主义倾向、保守主义倾向均与政治支持呈显著的正相关性($\beta_1=0.237$, $\beta_2=0.249$),而自由主义倾向则与政治支持呈显著的负相关性($\beta=-0.219$)。

模型 Y1 与 Y2 也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即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更容易激发青年民众的政治支持,自由主义反之。比较模型 Y1 与 Y2 发现,在年轻一代青年中社会主义倾向对于政治支持的正向效应($\beta = 0.261$)要明显高于保守主义($\beta = 0.171$),而在上一代青年中,保守主义的正向效应($\beta = 0.320$)明显比社会主义($\beta = 0.236$)更高。这一数据结果表明,保守主义倾向对中国年轻一代青年群体政治支持的影响不如上一代青年显著,由于三类政治观念对两个年龄段的青年政治支持均有显著影响,假设 5.2 未能得到证实。

3. 交互效应方面。模型 M2 的回归结果表明,政治观念中仅有社会主义倾向减弱了西方媒体使用与政治支持之间的负向关系,商业媒体使用的交互项虽显著,但由于主效应不显著故难以做出判断。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倾向在西方媒体使用对政治支持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社会主义倾向越高,西方媒体使用的负向效应越小($\beta = 0.079, p < 0.05$),从而显著弱化了西方媒体使用与政治支持降低之间的关系。由此,假设 3 得到了部分支持。进一步比较模型 Y1 与 Y2,前述调节效应仅在年轻一代青年中显著,而在上一代青年的政治观念中,保守主义倾向发挥着类似的调节作用,即保守主义倾向越高,西方媒体使用的负向效应越小($\beta = 0.113, p < 0.05$)。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的调节效应分别在年轻一代青年和上一代青年中表现得明显。

4. 社会资本方面。模型 M2 表明,不论是桥梁式资本还是纽带式资本,都与政治支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beta_1 = 0.118, \beta_2 = 0.095$)。但在区分了样本年龄段后,二者与政治支持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差异。对于年轻一代青年而言,桥梁式资本越高,其政治支持水平越高($\beta = 0.211$),纽带式资本未见显著;而对于上一代青年,纽带式资本越高,其政治支持水平越高($\beta = 0.196$),反而是桥梁式资本未见显著。这说明,在线上社会资本转化为普遍性政治支持的过程中,一是年龄层级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二是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型所发挥的转化机制不同,而这种不同恰与年龄层次存在关联。

5. 控制变量方面。模型 M1 与 M2 均表明,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受访者,政治支持水平越低;而在本文所区分的两个年龄段中,这一显著性仅在年轻一代青年样本中有所体现。这也意味着,家庭年收入对于政治支持的影响可能与年龄分布有关。

四、结论与讨论

政治支持是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以往研究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公众中有着较高的支持度^[67],而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政治支持的来源则由经济发展绩效转向政治制度绩效^[68]。在此基础上,媒介化政治的普遍性日益显现,不论是政治知识的来源、政治意见的表达,还是政治参与的行为,都越来越离不开媒介以及媒介化手段。因此,对中国民众的媒介使用与政治支持展开系统性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作为“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的当代中国青年,又在滚滚前行的时代洪流之下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69],理应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探究影响青年民众政治支持的媒介化因素及其机制。本文采用配额分层抽样调查与逐步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媒介使用、政治观念和社会资本三类变量对于青年政治支持的影响和相互作用,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媒介使用与青年政治支持有着显著的关联。本文发现,主流媒体的使用对于青年民众政治支持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西方媒体的使用倾向于降低青年的政治支持水平,而商业媒体的使用仅在年纪较长的青年群体中负向影响其政治支持。一方面,作为对中国政制政体的

支持态度,普遍性政治支持在主流媒体、商业媒体和西方媒体之中可能存在天然差异^[70],例如商业媒体、西方媒体很少像主流媒体那样,展现出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高度肯定;另一方面,媒体自身展露的政治态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传递到公众之中,抑或公众所进行的媒介选择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政治倾向,二者之间的协商互构机制目前仍不为学者们所探明。

因此,本文所得结论仅仅意味着媒介使用行为本身与其政治支持之间的关系,难以简单推论至媒体政治倾向或个人政治观念,但它无疑为后二者暗示了其中可能的关联性。为此,政治观念同样成为本文的解释变量之一,而在控制了政治观念及其调节效应后,媒介使用影响青年政治支持的结论仍然成立。

第二,政治观念既直接影响着青年的政治支持,又在媒介使用对政治支持的影响机制中发挥调节效应。回归模型结果发现,社会主义倾向、保守主义倾向更容易激发中国青年民众的政治支持,而自由主义倾向更可能抑制政治支持;西方媒体使用对政治支持的负向效应会被社会主义倾向减弱。这表明社会主义倾向对政治支持的影响存在两种途径:既有直接效应,又通过调节减弱西方媒体的负向效应以提高政治支持。另外,社会主义倾向的调节效应主要在年轻一代青年当中发生,而对于年纪较长的上一代青年,保守主义倾向所发挥的直接效应与调节效应均更显著。这也暗示了两代青年之间政治支持的内在动因的不同。相较之下,自由主义倾向主要通过直接效应降低青年民众的政治支持,与西方媒体使用对政治支持的负向效应相互独立,缺乏经由媒介手段的影响途径。

第三,与上一代青年相比,作为数字时代原住民的年轻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机制存在明显差异。一是媒介使用方面,年轻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主要容易受西方媒体影响而降低,而上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则更多地因为主流媒体的使用而提升、因商业媒体的使用而下降。这反映出媒介与意识形态的时代性问题,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色彩所影响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一代的青年群体并且主流媒体对后者政治支持的建设作用影响甚微。

二是政治观念方面,尽管三类政治观念的影响效应都呈显著,但区别在于,年轻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受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观念影响更大,而上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则受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影响更大。同时,政治观念的调节作用也在两代青年中存在差异,年轻一代青年中主要由社会主义倾向减弱西方媒体对于政治支持的负向作用,而上一代青年中则主要由保守主义倾向进行调节削弱。这既与两代青年的成长历程与政治社会化密不可分,又表明年轻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受到保守主义倾向影响要更弱一些,年轻一代青年的传统文化认同转化为中国政制政体支持的比例有所下降,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三是社会资本方面,年轻一代青年倾向于将象征弱关系的桥梁式资本转化为政治支持,而上一代青年则倾向于将象征强关系的纽带式资本转化为政治支持。这一区别映照着一整代人的社会观念变化。具体来说,上一代青年的政治社会化主要完成于互联网发展前的十年,作为集体的社区或社群在其政治观念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互动频率高、带来情感支持的纽带式资本方能为其带来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一般性支持。相较之下,年轻一代青年的政治社会化主要完成于互联网发展的十余年间,人们之间广泛而普遍的相互联系使其得以接触并形成相对多元的社会认知和政治知识。在这一过程中,互动频率低、带来广泛知识的桥梁式资本越高,其对社会的了解与信任越深,政治支持水平也就越高。

总的来说,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民众的政治支持水平主要受政治观念的直接影响,但对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群体而言,媒介使用已然成为影响其政治支持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政治观念在其中起到了主要的调节作用,并通过媒介化手段影响青年的政治支持,自由主义倾向则更多地直接降低青年的政治支持。从代际的角度分析,年轻一代青年的政治支持易受

西方媒体影响而降低,上一代青年则易受主流媒体、商业媒体的影响。保守主义倾向对上一代青年政治支持的正向影响要比对年轻一代青年的影响更大,而社会资本转化为政治支持的机制类型也从纽带式资本为主导转向了桥梁式资本为主导。

基于前述研究结论,本文对数字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始终坚持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就青年的政治支持而言,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观念无疑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因此,要坚持“党管青年原则”^[71],充分重视青年的意识形态工作,引导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好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第二,充分重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介渠道对当代青年的政治意识塑造,积极主动发挥党的媒体的思想引领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成为网络空间的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并在媒介技术内嵌到社会生活的深刻改革过程中充当领头羊和主力军,但与此同时,青年们也更容易受到西方社会思潮影响。对此,党的媒体要积极主动地占领互联网舆论阵地,以符合青年传播特点的方式方法发挥思想引领作用。第三,充分认识当代青年发展与成长的新特点、新规律,以创新手段深入凝聚、团结并引领青年。互联网发展十余年形成的广泛连接构筑起了新一代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背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成为青年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广阔天地,各平台、媒体要建设良好的网络生态、形成共同的社会理想,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在春风细雨般的潜移默化中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化成果。

总之,关注并侧重于媒介化政治这一社会语境固然是本研究的亮点所在,但将本文限制于文化主义的研究路径之上,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度感知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而媒介作为社会认知的主要来源,必然与其存在潜在的关联性,这有待后续继续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 [2] Easton, D. A Re - 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1975 , (4) .
- [3] [60] Norris, P. . Critical Citizens :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 pp. 9 - 13 , pp. 21 - 35 .
- [4] 赵健池 王正绪:《政治信任:概念史回溯与实证研究反思》,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 [5] 王正绪:《政治信任研究:民本主义的理论框架》,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
- [6] 虞崇胜 张 星:《民生与民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条件下党的合法性基础转型》,载《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5期。
- [7] 夏志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 [8][67] 陈 捷:《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安 佳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4、115-117页。
- [9] Wang, Z.X., You, Y.. The Arrival of Critical Citizens : Decline of Political Trust and Shifting Public Priorities in China ,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 2016 , (1) .
- [10] Noelle - Neumann, E. The Spiral of Silence :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1974 , (2) .
- [11]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富媒体 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谢 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386页。
- [12] 王维佳:《反思当代社会的“媒体化政治”》,载《新闻大学》,2017年第4期。
- [13] Gerbner, G. .Toward “Cultural Indicators” : The Analysis of Mass Mediated Message Systems , AV Communication Review , 1969 , (2) .
- [14] Mukerjee, S., Yang, T. . Choosing to Avoid? A Conjoint Experimental Study to Understand Selective Exposure and Avoidance on Social Media ,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 2020 , (3) .
- [15] Nickerson, R.S.. Confirmation Bias :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in Many Guises ,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 1998 , (2) .
- [16] [58] 虞 鑫 王金鹏:《重新认识“信息茧房”——智媒时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共生机制研究》,载《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3期。

- [17][30][61][68] 郑振清 苏毓淞 张佑宗:《公众政治支持的社会来源及其变化——基于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SGS)的实证研究》,载《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
- [18] 卜建华:《当代青年学生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方式与疏导》,载《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7期。
- [19] 刘海龙:《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 [20] 刘 康:《“去中心化—再中心化”传播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双重困境及建构路径》,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5期。
- [21] 杨章文:《网络泛娱乐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及其“解蔽”》,载《探索》,2020年第5期。
- [22] Anderson, C.J., Guillory, C.A. .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 Cross - National Analysis of Consensus and Majoritarian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7, (1).
- [23] Dalton, R. J. . Political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7-77.
- [24] Mishler, W., Rose, R. .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 - 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1, (1).
- [25] Criado, H., Herreros, F. . Political Suppor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7, (12).
- [26] Tang, M., Huhe, N. . Contextualizing the Economic Basis of Political Support: Government Economic Engagement, Economic Perceptions, and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20, (2).
- [27] 李艳霞:《何种治理能够提升政治信任?——以当代中国公众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载《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7期。
- [28] Shi, T. J. .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1, (4).
- [29] Oskarsson, S. . Generalized Trust and Political Support: A Cross - National Investigation, *Acta Politica*, 2010, (4).
- [31] Moy, P., Scheufele, D.A..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and Social Trust,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0, (4).
- [32] Chen, X.Y., Shi, T.J..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RC in the Post Tiananmen Period, *East Asia*, 2001, (3).
- [33] Lu, J. . Acquiring Political In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Various Media Channels and Their Respective Correl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3, (83).
- [34] Tang, M., Huhe, N.. Alternative Framing: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Support in Authoritarian Chin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4, (5).
- [35] 章秀英 戴春林:《网络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路径——基于9省18个县(市)的问卷调查》,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 [36] Huang, Y. X., Wang, L. . Politic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in the Digital Era: How Media Engagement Divides Chinese Neotize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2021, (3).
- [37] 卢春天 权小娟:《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5期。
- [38] Tang, M., Huhe, N.. Parsing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Regime Support in Chin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20, (1).
- [39] 喻国明 陈雪娇:《中国传媒经济研究2021年文献分析:发展转向与未来趋势》,载《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1期。
- [40] Xu, P., Ye, Y.J., Zhang, M.X..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Media, Social Media, and Foreign Media on Hierarchical Levels of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Global Media and China*, 2022, (3).
- [41] 张明新 刘 伟:《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载《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1期。
- [42] Wang, S.R.. Internet Exposure and Political Beliefs among Educated Youth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4, (90).
- [43] 马得勇 王丽娜:《公共舆论倾向如何形成?——对网民政治支持的实证分析》,载《探索》,2016年第6期。
- [44][62] 王 菁:《媒介使用与民众政治支持:面向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证分析》,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年第2期。

- [45][52] Huang, H.F., Yeh, Y. Y.. Information from Abroad: Foreign Media, Selective Exposure and Political Support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9, (2).
- [46] Eagleton, T..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erso, 1991, pp. 1 – 31.
- [47] Jost, J.T., Federico, C.M., Napier, J.L.. *Political Ideology: Its Structure, Functions, and Elective Affiniti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9, (60).
- [48] 甘 阳 等:《儒学与社会主义》,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
- [49]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 [50] 张 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8页。
- [51] Flaxman, S., et al.. Filter Bubbles, Echo Chambers, and Online News Consump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16, (S1).
- [53] Swart, J., Peters, C., Broersma, M.. Navigating Cross – Media News Use: Media Repertoires and the Value of News in Everyday Life, *Journalism Studies*, 2017, (11).
- [54] Haim, M., Graefe, A., Brosius, H – B.. Burst of the Filter Bubble?, *Digital Journalism*, 2017, (3).
- [55] Zmerli, S., Newton, K.. Social Trust and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008, (4).
- [56] Putnam, R., Leonardi, R., Nanetti, R..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7.
- [57] Putnam, D.R..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Lesley Schulte, 2000, pp. 22 – 24.
- [59] Inglehart, R., Welzel, C..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 – 12.
- [63] 马得勇 王丽娜:《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的分析》,载《社会》,2015年第5期。
- [64] Wu, A..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Over a China – as – Superpower Mind – Set: An Exploratory Charting of Belief Systems Among Chinese Internet Users, 2008–201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4, (30).
- [65] Williams, D.. On and Off the 'Net: Scales for Social Capital in an Online Era, *Journal of Computer – 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06, (2).
- [66] Ellison, N.B., Steinfield, C., Lampe, C..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 – 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07, (4).
- [69] 郭元凯:《新形势下我国新兴青年群体的特征变化、风险挑战及对策思考》,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
- [70] 徐亦舒 张涛甫:《中国共产党百年媒体政治逻辑嬗变研究》,载《新闻大学》,2021年第12期。
- [71] 王冬梅:《“党管青年”的政治内涵、理论贡献与时代意义》,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责任编辑:张 丹)